

Zhuixun zhongguoshehui de zixing

追寻
中国社会
的自性

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

主编
陆学艺 王处辉

Zhongguoshe
huisixiang
lilunji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三-447

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

——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

主编 陆学艺 王处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 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 / 陆学艺,
王处辉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219-05049-6

I. 追... II. ①陆...②王... III. 社会学—思想史
—中国—文集 IV. C9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24551号

.....

策 划 温六零
责任编辑 廖集玲
责任校对 陈红燕

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

——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

主 编 陆学艺 王处辉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11.5 印张 305 千字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印刷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000 册

ISBN 7-219-05049-6/C · 164

定价: 25.00元

序 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陆学艺 王处辉

社会思想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属理论社会学的范畴。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历代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理论社会学最有中国特色的分支学科之一。

我国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学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无论是理论社会学还是应用社会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学家们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已充分地意识到：①社会学学科若没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其应用研究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②社会学基础研究的研究如不能与中国自身的传统相结合，以形成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则不能对中国的应用社会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③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中寻求，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国度。因此，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基础理论，就不能忽视中国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想之精华。近年来老一辈社会学家如费孝通先生、袁方先生等，之所以反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思想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国家社科基金之所以把中国社会思想史作为“九五”期间“重大项目”，我们认为其主要意义即在于

此。或者说，如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①，就不能割裂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果我们要解读现代中国社会，就不能忽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如果我们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就不能不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如何？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其发展趋势如何？时至今日，还没有人进行过较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我们根据多年来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心得，就上述问题的了解和思考作归纳，以与时贤共同探讨。

一、对 1949 年以前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估价

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之发展史的估价，可从 1949 年画线，分为前后两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如孙本文、黄文山、施存统、徐逸樵、王守礼等，都出版过社会思想史著作，但均为外国社会思想史，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据我们所见，仅有三种：程伯群的《中国社会思想史》^②，此书不足十万字，过于简单。郭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出版过两种书，一名《中国社会思想史》^③，一名《中国社会思想概观》^④，此两书的内容大同小异，字数也基本相同，都只有四五万字。这些书籍现在已很难觅得了，我们几经周折，才见到以上三书，但由于其参考价值不大，颇有失望之感。另外，据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的资料可知，潘光旦先生曾开设过“儒家社会思想研究”之课程，按潘光旦先生的学识推断，他的讲授当是有深度的。但时至今日，尚未见有人将该讲义整理出版。其讲稿是否尚存于世，亦不得知了。李安宅先生 1935 年出版过《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⑤ 一书，约四万字，可谓笔

① 海外称“社会学本土化”

② 世界书局 1937 年版

③ 平凡书局 1929 年版

④ 光华书局 1930 年版

⑤ 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者所见之新中国成立前旧著中质量最高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学界，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换言之，截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半个世纪的历程中，所走的是一条逐渐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道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社会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开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如孙本文先生在他所著《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即指出：“中国社会思想，为研究中国社会学者必须研究之材料。”^① 20世纪40年代中期，孙本文发表了一篇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学》的论文，又于1948年出版《当代中国社会学》^② 一书，均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这个建议可以代表当时的社会学界对“今后应从事的工作”（孙本文语）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第二是“中国应用社会学的建立”。在第一个方面，孙本文先生提出三项工作，他说：“今后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其重要工作有三：一、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二、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三、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其所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即“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一项中，又开列出五项具体工作目标，孙本文先生说，其中的第一、二项具体工作为：

（一）关于社会学说者。凡古人对于社会生活或社会问题的各种思想，均应加以搜集与整理，依历代顺序，编成有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

（二）关于社会理想者。古今贤哲发表有关社会组织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理想与计划，亦应加以搜集与整理，编成一部中国社会理想史。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规划中，孙本文先生是把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理想史作为“中国理论社会学的建立”

① 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84页

② 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中最首要的任务提出来的。由此可知，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把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放到了何等重要的地位。也由此可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社会学界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仍在起步阶段，尚无较有分量的成果问世。

另外，龙冠海先生在出版《社会思想史》^①一书时，曾在“初版序”中简要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教学研究状况，可作为我们估价这一问题的佐证。龙冠海先生说：

记得大概自抗战初期起，我国教育部开始厘定大专各院系统一化必修课程，在社会学系必修科目内，曾列有“中国社会思想史”与“西洋社会思想史”二科……但逾时不久，大概因为有些学校不易找到人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当教育部修订大专课时，该科目便被取消，而将原订二科并为一科，统称为“社会思想史”，一直沿用到现在，规定为一年课程，计六至八学分。考诸外国，如美国，各大学社会学系差不多都将“社会思想史”列为一门必修课程，故实际上它是社会学中一门最基本科目，凡是研究社会学的人都必须读的。……但回顾我国，不仅中国社会思想史之作尚无一本完全者（据本人所知，过去大陆曾有人出版过两种很简略的，今在台湾已不易找到了）。就是“西洋社会思想史”，除了两三本翻译者外（今也已不易找到），本国人写的也还没有一本比较详细的。

总之，20世纪前半叶，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所在，但尚无能力进行深入研究，甚至连能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的教师都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当时的教育部将中外社会思想史合而为一，乃是不得已之举，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当时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之重要性的认识有所下降的结论。

^① 台湾三民书局1967年版。笔者识：该书为西方社会思想史

二、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2年12月，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此次调整，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中，只剩下两所大学的社会学系仍得幸存，到1953年进一步调整高等院校时，连这两家社会学系也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学被取消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更无法提上日程。直至1979年中国大陆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学科之后，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才重新起步。但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及侨居海外的中国社会学家的社会学研究，包括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则不存在这个中断的问题。因此，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当分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二是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

（一）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

1979年恢复与重建社会学学科后，1980—1982年，我国高校建立起了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批社会学系，包括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其中设专人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与上海大学^①社会学系为最早。时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的袁方教授苦于本系一时无合适之教师从事此项教学研究，请早年曾师从于孙本文教授学习社会学、时为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的陈定閔先生讲授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如前所述，由于这些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都在一个并不厚实的基础上起步，加之此项研究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奏见显效，所以经数年努力，于1989年出版了王处辉所著《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②，于1990年出版了陈定閔先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③。陈定閔先生著作之内容，包括从先秦至清末，可谓我国

① 今之上海大学，当时称复旦大学分校

②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王著上册虽比陈定闳先生早出一年，但只论述到隋唐五代而止，下册直到2000年才出版。读陈定闳先生的著作，知其以八旬高龄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领域勤奋耕耘，颇下了一番工夫，堪称是一部有水平的著作。但综合考察，其对浩如烟海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料的直接发掘尚显不足，一些结论也有待商榷。如该书中说“中国社会思想史比较完整的有体系的社会理想较之西方……相对的贫乏”^①，并把这点作为中国社会思想的特征来论述，这是颇值得商榷的。但陈先生已不幸作古，商榷或修订都是不可能的了。

另外，王著与陈先生所著之中国社会思想史，都是以作为高校教材为首要目的，都较充分地体现了系统、全面的特点，王著还属国家教委“七五”部编教材之一。此两书都很便于大学生和初涉这个领域的学者阅读。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有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教材出版^②，但以总计20多万字的篇幅，总结中国五千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社会思想，显得过于简略了。

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专著，解放前有前述李安宅先生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社会学学科恢复后，有王处辉著《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③。该书是作者从事中国社会思想史教学与研究十几年体会之集合，分十个专题考察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及特点。时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袁方教授为王著所作序言中，再一次强调了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意义，并对作者多方鼓励和鞭策。王著作为一家之言，对于我国开展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或有抛砖引玉之作用。此外，按作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定义^④，陈正炎等所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⑤当属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范围，可谓研究中国历代理想社会模式的一本专

① 陈定闳著：《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吴根友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④ 王处辉著：《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绪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著。至于再早一些时候出版的如《王船山的社会思想》^①一类小册子，虽以社会思想命名，但就内容而论，则不属中国社会思想方面的著作。

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三项：一项是由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承担的国家“九五”重大项目“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课题。该课题组的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正在实施中；一项是由王处辉承担的国家教育部“九五”重点高校教材《中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的研究与编写；一项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承担的教育部的“二十一世纪课程体系研究”系列中的中国社会思想史课程体系研究。以上各项研究工作都在积极地进行之中。

(二) 港台地区及海外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

港台及海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支：其一为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其二为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性研究，兹分别论述如下：

其一，从事系统的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张承汉、曾松友、杨懋春、杨孝濂等。

按出版时间顺序，以曾松友的《社会思想史》^②为最早。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论述西方社会思想，“下编”论述中国社会思想，共约15万字，分为十章。分别论述中国早期社会思想、中国古代礼教社会思想、孔子与儒家社会思想、老子社会思想、庄子社会思想、墨子社会思想、王充社会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社会思想等。不难看出，其重在先秦诸子，从两汉到民国，只论述了王充、孙中山。作为一部社会思想史，跳跃性过大，也很不系统。

杨孝濂著《中国社会思想史》^③，明显地比曾松友的著作增强了系统性，全书共分14章，分别论中国早期社会思想、周公与西

① 汪毅著，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

②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③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

周、孔子与儒家、老子与道家、墨子与墨家、韩非与法家、其他诸子百家、两汉魏晋至隋唐、宋元明、清、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想。其特点是先秦部分按学派分章，两汉以后则按朝代分章，前详而后略，而且全书也只有12万字左右，分量尤显不足。

杨懋春的《中国社会思想史》^①和张承汉的《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②于同一年出版。杨懋春的著作具有几个特点，其一是尊孔，以儒家社会思想作为正宗；其二是论述较前人更为系统详尽；其三是包括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及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其四是全书达50万字，其规模已属空前。

龙冠海先生早有志于写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但终生未能如愿。张承汉先生继承其遗志，完成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港台及海外学者完成的较为规范的，也是水平较高的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其上册共分五编，第一编为绪论，论述中国社会思想的性质等问题；第二编为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殷周及春秋战国儒、道、墨、法、杨朱的社会思想；第三编为两汉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这个时期12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第四编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了这个时期的5位思想家及佛教的社会思想；第五编为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了这一时期6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上册约25万字。其下册于上册出版八年之后，到1994年正式出版，约26万字，包括四编，即第六编为宋元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这个时期的李觏、王安石等6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第七编为明清时期的社会思想，论述这个时期11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第八编为民国时期的社会思想，此编着力最多，分量相当于六、七两编的总和，论述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炳麟、蔡元培、胡适等8位思想家的社会思想，其中论孙中山和梁启超尤为详尽。可以说，民国时期是作者研究最深的一编，也是全书最有特色的一编。最后一编即第九编为中

① 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6年版

② 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版

国社会思想的回顾与前瞻。如前所述，该书确是迄今为止港台及海外学者完成的较为规范、系统的一部中国社会思想史著作。这里说其较为系统也是相对而言的，如作为一部思想通史性著作，竟把宋代理学家张载、二程、朱熹的社会思想置于研究视野之外，即是一个重大缺憾。又如，作为学术著作，却在最后一编时时不忘批评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则委实过于偏颇，不足为取。

其二，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研究，当以余英时、文崇一、李亦园、叶启政、金耀基、张德胜等为代表。

其基本特点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特点及其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如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①，即是沿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路，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成功之作。他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②中收集的论文以及《士与中国文化》^③等著作中的论文，大都可视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文崇一先生对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研究以及对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都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拓宽了领域；叶启政对中国传统思想与知识分子的研究，可与余英时等人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研究相呼应；金耀基先生所著《中国社会与文化》^④、《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⑤以及《从传统到现代》^⑥、《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⑦等著作中，大都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发掘与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张德胜先生所著《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中国思想的社会学诠释》^⑧，当属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一部有特色的专著。该书认为，“儒家伦理千条万条，但归根究底，不外乎从一个追求秩序情

① 详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台湾三民书局1978年版

⑥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9年版

⑦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7年版

⑧ 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

结衍生出来”，即认为儒家社会思想的核心是追求社会稳定，为保持社会稳定而特别强调社会秩序。就连法家、道家、墨家乃至中国的佛家也无不重视社会秩序。总之，作者认为，因追求社会稳定而尤重秩序，是中国历代社会思想的特点所在。其论点颇有新意，堪成一家之言。另外，张德胜先生所进行的儒商研究，他与王处辉等合作所开展的“清初三大家私利观的社会网络研究”等，都带有将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推向深入的倾向。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理论性问题

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是由西方率先创立的，但人类对社会生活、社会问题和社会模式的思考与构想，即“社会思想”则由来已久，绝不是从有了社会学之后才开始的。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当然有必要对中国社会思想史作深入研究。我们要共同推进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亟须探讨和解决的理论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如何摆脱中国社会学的依附地位问题

不少受过西方社会学系统训练的中国的或华裔社会学家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即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费孝通先生早在1947年就发表文章，对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提出批评，说中国社会学“辩论里所应用的论据，多引用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里的各种派别，各从他们所授的生徒，分别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所不尽同于西洋社会学的是在它们与实际社会的关系上：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时，却剩了一套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洞理论”^①。旧中国的社会学虽在“中国化”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总体来说，对西方社会学的依附性却是很强的。

^① 费孝通：《中国社会学的成长》，载《社会研究》1947年第7期

那么，于费先生发表上述意见半个世纪后的现在，中国社会学的情况又如何呢？香港中文大学李沛良教授说，直到现在，社会学界仍处于“大部分社会学知识（包括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源自西方学者并由西方社会事实所证实。人们无法断定在何种程度上这些知识与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相关或可用”^①的状况之中。总之，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学理论是建立在具体的“实际社会”和“社会事实”的基础之上的。从某一实际社会归纳出的“通则”未必适用于另一个实际社会，所以，用西方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社会事实，则常有扞格不通之处^②。如果只满足于用中国的社会事实解释西方某些社会学理论及命题，或论证西方某些社会学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那么，中国的社会学将永远处于“依附”地位。社会学摆脱依附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加强对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中国历代社会思想当是现今中国诸多社会事实和特点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如何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问题

各个社会的不同特点主要源于各自的文化个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家就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李沛良教授则于最近提出中国社会学应加强“适切研究”的观点，认为适切研究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依据对当地社会生活的深入调查和紧密观察，发掘具有文化特质的概念与命题”^③。但社会文化的特质或性格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考察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化特质，就必须检视其由来。

中国的人文传统深厚，对社会人事的思考由来已久，且在世界思想文化中独树一帜。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各派社会思想在其自身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对中国人的社会理念及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已渗透、沉淀到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之中。只有对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之后，

^{①③}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载《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② 参见王处辉：《中国文化中的“角色理论”刍议》，载《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11期

才能较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社会事实，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人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因此，加强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三）如何看待“早熟”的中国社会思想之现代意义问题

王处辉在所著《中国社会思想早熟轨迹》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思想是早熟的，并认为中国思想一向偏于社会人文方面，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较为稳健、成熟的社会思想了。再经一千多年的发展与融合，到宋代理学家社会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社会思想的成熟体系已经完成，从此以后基本格局已定，因袭多而创新少。明清时代是程朱理学家的社会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理学开始被封建统治阶级神学化了。清代考据学日兴，社会思想的创新性更是日渐低落。在明代以前，中国社会思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相比具有显著的早熟性。明代中期以后直至近代，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世界了，中国的社会思想也变得贫乏而僵化了。相比之下，西方思想从古希腊起即偏重对自然的探索，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盛行，人文思想更是掩抑而不彰。恰与中国社会思想由早熟而走向僵化和贫乏的同一时代，西方的世俗精神开始复活，以文艺复兴为契机开启了人文主义运动的新时代，其社会思想也由此而日渐活跃，各种新的社会思想大量涌现，而且其发展趋势是充满活力，愈后愈胜。相对于西方社会思想正处于上升繁荣阶段而言，中国社会思想则显示为早熟后的停滞状态。只是到了近一个世纪，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社会思想才又重新开始活跃起来，但已比西方迟到了数百年。这一研究结论被诸多社会思想史研究者所赞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为何会早熟？而新的活跃期又为何会迟滞呢？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里，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否有可能再领风骚，为人类的“共存”与“共荣”产生现代意义呢？费孝通先生在近年的一些著作中对此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说，当今世界“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并希望

“新孔子”能“通过科学，联系实际，为全人类共同生存下去寻找一个办法”。同时还指出：“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的相处讲了三千年了，却忽视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的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① 费先生是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中国社会思想具有早熟性，并认为在人类的“共荣”与“心态”问题已成为时代课题的当今社会中，对中国早熟的社会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应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四）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在“文化自觉”中的地位问题

几年前，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界提出了“文化自觉”的任务。其“文化自觉”的提出是从其对下列一连串的问题开始的：“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思考就是“文化自觉”^②。在论述文化自觉的方法时他又指出：“反思实际上是文化自觉的尝试。……希望大家能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③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在文化自觉之中占有重要地位。

优秀的传统社会思想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中，应大力地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历代优秀的社会思想。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能注重继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者太少了。这种情况

^① 以上均引自费孝通《孔林片思》。见《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②③}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见《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页

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也是离“文化自觉”相去甚远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强调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和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文化自觉中的应有地位，是与近代以来的“复古派”、“东方文化派”以及当代海外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论”有本质区别的^①。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是对包括中国传统优秀社会思想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传统社会思想和文化，是实现文化自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近年来一直倡导的“文化自觉”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中国要达到“文化自觉”，离不开对原有社会思想的总结。总结也是一种创新。在此过程中，包含着总结者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理解，同时也反映出总结者“文化自觉”之程度。

(五) 如何立足于中国社会，反思中国社会学之风气问题

学术发展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在中国社会学中，所谓“陈”至少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原有的社会思想，二是西方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理论，二者能结合融贯才会有创新。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出，某一时代的学术风尚会趋于偏颇，如果学者囿于时风，眼界规模就会偏颇狭窄，不能完备。可是人们往往并不自觉，自以为胜过前人，但时过境迁，风气转移，便发现自己在诸多方面并没有超过前人。西方学者也有“范式革命”的说法。这都提示我们要摆脱一时的学术风尚之偏见。所以学者贵在开风气，不贵趋风气。试问目前中国社会学界的风气是否也有偏颇呢？如果有，又当如何矫正？是否可以吸取传统的精华以补现代社会学之偏，以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救一味学步西方社会学之弊？为此，我们认为应重视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优秀社会思想的研究和对其进行现代社会学诠释，亦即通过对中国社会思想的“适切研究”，发掘出具有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